

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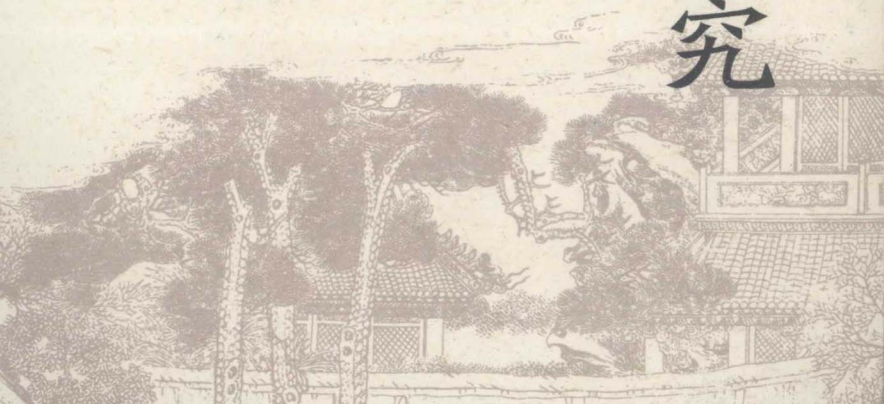


周榆华

著

【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黄天骥学术基金丛书之十八】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519199

【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黄天骥学术基金丛书之十八】

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

周榆华

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 1519199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周榆华著. —2 版.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5

(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黄天骥学术基金丛书)

ISBN 978 - 7 - 5361 - 4053 - 0

I. ①晚… II. ①周… III. ①文化 - 名人 - 人物研究 - 中国 - 明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8555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510500

营销电话: (020) 87551597

网址: www.gdgjs.com.cn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30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2 版 201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 001 ~ 3 000 册

定价: 32.00 元

前记一

黄天骥

中国古代戏曲和古代文学作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华夏子孙，有责任发掘开采，分析整理，让体现着东方文化的瑰宝，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焕发光辉。自然，我们也不能一味陶醉在祖先遗泽之中，审视它，研究它，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有助于祖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才是我们整理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的目的。

近几年，广东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在这块热土中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因而采取多种方式，大力推动对中华文化的学术研究。因时际会，“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基金”得以乘风御气，建立起来。有了这个条件，我们就有可能出版丛书，在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领域中，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也是为了纪念王季思老师。

王起，字季思（1906—1996），浙江温州

人。早岁师从孙诒让、吴梅先生，以《西厢五剧注》名世。20世纪40年代后期，王季思老师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历任中文系主任、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等职。数十年来，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的工作中，在古代戏曲、古代文学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王季思老师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被公认是中国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的权威。

王季思老师一生热爱学生，教育青年。他常说：学术乃天下公器。学生和后辈学者向他求教，他从来都认真、热诚地给予帮助。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他还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矻矻穷年，不遗余力。他经常强调建设祖国教育和文化事业，要有人继承，渴望薪火相传，让中华文化之光一代又一代照遍大地。

弘扬中华文化，继承王季思老师匡扶后进的精神，是受过他老人家教诲的学生的共同心愿。1993年，广州市政协和中山大学联合主办“庆祝王季思教授从教七十周年大会”。其后，诸位校友像杨资元、赖春泉等学长，深感为促进学术的发展，应做一些更加切实的工作，朱孟依先生积极支持。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我们决心出版这一套丛书，希望能实现王季思老师多年的心愿，帮助热心于中国古代戏曲古代文学而又甘心坐冷板凳的学者迅速成长，让学术之花也在生长红棉的土地上盛开。

学术的殿堂是靠一砖一石垒成的，我们希

望扎扎实实地奋工添瓦，不想欣赏海市蜃楼。目前，我们的能力有限，更兼文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的想法是：环绕着中国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的论题，逐年出版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日积月累，代代相传，我们一定能在祖国学术领域的南天，垒筑起一座丰碑。

王季思老师曾有诗云：

人生有限而无限，历史无情还有情；

薪火相传光不绝，长留双眼看春星。

丛书付梓之际，我们抄录这首诗，作为奠基之石，以明旨意，兼励来者。

1996年6月16日于中山大学

前记二

欧阳光 康保成

自1996年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学术基金丛书第一种出版以来，迄今已过去了整整十年。十年来，我们根据有限的财力，精心甄选入围选题，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以每年一到两种的节奏，已陆续出版了13种著作。

看着眼前这套积少成多渐成规模的丛书，不禁让人深深感慨。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中青年学者或博士学位获得者，选题以古代戏曲研究为多，同时也涵括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这些著作也许算不上什么鸿篇巨制，我们也没有像时尚所热衷的那样对它进行包装和宣传，在当今热闹非凡的学术著作出版大潮中，它甚至显得有些冷清和落寞，但这些著作都是对有关领域作了艰苦细致的研究之后的心得之作，或对有关研究领域有所开拓，或推动了有关研究向纵深发展，自有其难以掩盖的学术价值。丛书从总体上展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中青年学者的风采，也体

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沉潜、严谨、包容、开放的良好学风。

最近，珠海市民营企业家李平秋先生捐资设立黄天骥学术基金，用于支持我系古代戏曲和古代文学等学科的发展。李平秋先生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之后投身于市场经济大潮，艰苦创业，努力打拼，取得了事业的成功；在事业有所成就的时候，却不忘回报社会。他有感于母系的培育之恩，倾心敬佩黄天骥先生的师德人品，因而出资设立以黄天骥先生命名的学术基金，其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校友之情，令人感佩。

这样一来，我们除了王季思学术基金之外，又有了黄天骥学术基金。两个基金虽然命名不同，其宗旨则是一以贯之的，即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的研究而添砖加瓦，略尽绵薄。根据这一宗旨，我们将把两个基金的增值部分合并在一起使用。其中继续资助出版中青年学者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帮助中青年学者在学术上更快地成长，仍然是两个基金的主要工作。

王季思先生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戏曲、古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黄天骥先生是继王季思先生之后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戏曲、古代文学学科的领军人物，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两位先生的共同特点不仅是重视学术的创造，同时也注重学术的传承，他们都倾力培养后学，提携奖掖不遗余力，这也正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戏曲、古代文学学科能够生生不息，始终充满活力，并不断有创

造性成果涌现的原因。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传承，也离不开积累，我们所做的正是传承和积累的工作。这一工作也许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明显的效果，但正如黄天骥先生在本丛书的“前记一”中所说的：“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日积月累，代代相传，我们一定能在祖国学术领域的南天，垒筑起一座丰碑。”

让我们以此互勉。

2006年11月16日于中山大学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文人辨析及明以前文人治生概况	(13)
第一节 文人辨析	(13)
第二节 明以前文人以文谋利及治生概述	(25)
第二章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状况	(37)
第一节 纲纪弛废和心学流行	(37)
第二节 市镇经济发达与尚利的世风	(45)
第三节 士风的变化	(55)
第三章 社会上的诗文消费需求	(67)
第一节 民间尚文风气	(67)
第二节 士绅的诗文消费及文人代耕	(80)
第三节 藩府戎幕对文人的吸纳	(91)
第四章 以文治生者的生成原因与群体特征	(102)
第一节 生成原因	(102)
第二节 群体特征	(110)
第三节 “诗在布衣”	(120)
第五章 以文治生的途径	(133)
第一节 府幕笔耕	(133)
第二节 市井佃文	(147)
第三节 其他谋生方式	(160)
第六章 治生心态与谋生诗文评析	(165)
第一节 治生心态	(165)
第二节 谋生诗文评析	(176)

第七章 “不幸若马耕”的徐渭	(193)
第一节 贫困身世与笔耕谋生	(193)
第二节 府幕经历及其代耕	(212)
第三节 性情文字与谋生文字论析	(225)
第八章 “山人竞述眉公”	(235)
第一节 不一样的隐士	(236)
第二节 闲人和闲人的生计	(249)
第三节 词坛中之文将	(260)
第九章 以文治生现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273)
第一节 治生者的文学活动	
——晚明小品蔚盛不可或缺的因素	(273)
第二节 以文治生行为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	(285)
第三节 谋生文人的市民化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292)
第十章 余论	(301)
第一节 清初至清中叶文人谋生类举	(301)
第二节 文人以文治生的几点困惑	(310)
附录：文人传记及以文治生资料摘抄	(314)
参考文献	(325)
后记	(331)

绪 论

一、论题的确立

纵览时人前贤的著述，笔者发现，对古代文人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名家名作或者是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上，对不知名或者根本无名的文人则关注得不够。出现这种现象，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一是名家名作在当时或后世都较为人注意，遗留下来的材料纵使零散但相对齐全，便于研究；二是他们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通常起着引领作用，是一段历史时期或一个朝代的文学丰碑，研究他们，等于抓住了文学的主流或核心，有提纲挈领之意义。

鉴于此，笔者打算去研究那些不甚知名文人的生存与创作情况。之所以有这种想法，首先，是自己才疏学浅，不敢去“炒现饭”，怕弄不出什么新东西来，陷入拾人牙慧的尴尬境地。其次，不知名文人尽管在“科名”或“艺苑”上默默无闻，但他们及其作品毕竟存在过，是一种“历史的真实”，通过研究，或许可以认识、了解他们，进而揭示出某些规律。再次，是他们既然存在过，多少会留下些相关的文献，无论是蛛丝马迹般的只言片语，还是整章整篇的记载，都值得去搜集、归纳乃至做系统的研究。至于能搜集多少材料、研究到什么程度，这既取决于客观文献的存在情况，又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

带着以上想法，经反复思考，笔者最终确定以晚明社会底层文人的生存状况及其谋生诗文作为自己的研究范畴。之所以选择晚明下层文人，基于以下考虑：

先是晚明下层文人的数量多。一个社会，文人的多少与当时的

人才选举制度、教育规模、经济状况、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有关。科举制度自隋唐建立以来，沿袭到明清，一直是中国社会举荐人才的主要途径，而为这种选举制度大量提供储备人才的学校教育制度，却是在明代发展、完善起来的。据《明史·选举志一》记载：

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十五年颁学规于国子监，又颁禁例十二条于天下，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足以说明当时朝廷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及其繁盛状况。这种重视及采取的相应措施，在明太祖之后，遂成为一种制度沿袭下来，迟至明覆亡也没发生什么大的改变。要说变化，只有入学名额上的增减，且一般是增得多、减得少，这点从生员名称的变化与增加上看得出来，如前期有廩生、增广生、附学生，中叶以后又有纳马纳粟捐银而出现的辽生、饷生、赞生之类。尽管后来张居正推行改革时，对学校生员名额有所裁减，但由于堵塞了士人仕进之路而遭到普遍反对，最终也是人亡政息。

学校教育的繁盛，一方面体现出士人地位独尊的传统和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与明代“科举必由学校”的规定有极大的关系。宣

德以前，科举之外尚有税户、吏员、征辟等用人途径，以后则专用科举，这必然迫使天下士人纷纷进入学校；再则，进入学校成为生员（主要指廪生）后，既有机会科举入仕，又可领取朝廷规定的廪膳银、享受减免徭役等优待。因此，入庠序读书是许多士子必须走并甘愿走的道路，这种情况在明代中后期尤为明显。由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一般家庭在积聚了相应的财富后，都设法培养自己的子孙后代读书、做官，当时的许多官员都出身商贾之家，如王世贞、汪道昆、黄省曾、张翰、李梦阳、何良俊、曹学佺、屠隆、顾宪成、田汝成、袁宏道兄弟、张献翼兄弟等，举不胜数。一些富庶地区，由此形成了重读书的风气，这里可引张岱与归有光的话为证：

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①

吴为人才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髻髻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江以南，其俗尽然。每岁大比，棘闱之外林立。京兆裁以解额，隽者百三十五人。故虽方州大邑，恒不能三四数。^②

明清以来吴越两地文人辈出，跟当地经济富庶、推崇读书的文化风尚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读书人之多，又见于具体数字，顾炎武在估计明末的生员人数时，说：“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③

读书人如此之多，可是仕进之路却只有科举一途，中式名额又有限，势必使多数读书人无法仕进而滞留于社会下层。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和被淘汰的生员曾纷纷撰文指出这一现象，并尝试提出解

① 张岱：《琅嬛文集》卷一，4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② 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九，19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③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一《生员论上》，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决的办法。如屠隆的设想是：“制科之外，当别开一途，或备德行，或负奇才，或学识足备顾问，或辞赋足润太平，名流郡国，取信乡间，而为制科所遗者，许有司特荐以闻，天子临轩，集公卿大夫亲试，果有可采，令得与制科士一体擢用。如遇非常之人，则待以不次之位，无徂常格。以制科罗英贤，以特荐网遗逸，庶可免明镜盖卮，腰镰刈葵之患乎？”^①屠隆的办法，实质是在制科之外增加举荐或征召的形式，以搜罗乡野遗贤，愿望是好的，可是行不通。

为什么行不通？因为有些制度一旦沿袭长久，便难以打破，即便打破，增加一些新形式，往往也不为人重视，可能流于形式。这从《明史·选举志三》的记载可得到印证：“自（永乐）后科举日重，荐举日轻，能文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有司虽数奉求贤之诏，而人才既衰，第应故事而已。宣宗尝出御制《猗兰操》及《招隐诗》，赐诸大臣，以示风励。实应者寡，人情亦共厌薄。”时人王鳌指出了荐举日轻乃至废弃的原因：“古者用人，其途非一，耕钓渔盐版筑饭牛皆起为辅弼，而刍牧贾竖，奴仆降虏，亦皆得为世用。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时时意外用人，若郁新、严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书，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纷纷皆得效用于时。降及后世，一唯科目是尚。夫科目诚可尚也，岂科目之外，更无一人乎？有人焉不独不为人知，即举世知之而不见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则群起而咻诸，亦且自退缩，前后相戒，谨守资格……是故下多遗贤，朝多旷事，仕法之过，端至上哉！”^②从中可知，后世在科目之外，不敢另设他途用人，是畏于群言，怕毁了祖宗旧制和破坏既有的公平形式，这在情理上说得过去。

但是，另有一个可能易被忽视的原因：科举制度只是一种官吏

① 屠隆：《鸿苞》卷五“用人”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8册，766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② 王鳌：《王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三《容庵葛君家传》。见吴晗：《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7~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选拔制度，并非用来扩大生员就业的制度，通过考试挑选出来用以任命官职的人自然相对有限。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譬如明代中后期，当生员大量增加，而官员的名额如果相对保持稳定或变化不大时，以竞争形式淘汰下来的人数无疑会显得特别多，更何况万历朝又出现了皇帝怠政、官员空缺不及时补员的情况。所以说，单纯地批评制度的机械刻板有时毫无意义，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这也是虽然许多士人屡屡指责科举取士途径过于狭窄单一，但终究无法改变既存事实的重要原因。

分析明代后期众多文人士子滞留社会下层的客观原因之后，接下来探讨他们的经济状况和可能的出路。陈宝良先后有数篇谈论明代生员的文章，这里就相关的内容和观点作简要引述：在《明代生员及其相关概念辨析》一文中，陈宝良指出生员是绅士、士大夫、文人的一员，并认为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生员人数的不断增加，生员已从绅士、士大夫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明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一文，陈宝良则从科举入仕、廪贡出学、纳马纳粟入监以及荐举与保举四个方面，对明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进行了初步的考察，认为明代生员层仕进之途（正路）相当狭窄，这是绝大部分生员流向社会的主要原因。而在《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一文中，陈宝良对明代生员层在经济上的诸项特权进行了具体考察，并对晚明生员层的相对贫困化也进行了一些勾勒，表明生员既是绅士层的一员，又与绅士层的上层在经济状况上存在较大的差距。陈先生在论述这些内容时，史料翔实，说服力很强。

不过，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笔者在此想补充一些看法。一是文人与生员本身属于两个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的，文人不一定有生员资格或其他名衔，生员也不一定都可以冠上文人之名，二者是一个交叉概念，但文人多半是最初进过各级学校读书的生员，这是常识。二是生员的贫困问题，生员是“科名”，是走向仕途的最初通行证，拥有它虽然可以得到某些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但离位尊多金、封妻荫子等人人追逐的“功名”还有一段很

远的距离，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起初家境就并不十分富裕，又加上进学、考试、人际应酬等花掉了不少费用，如果没有通过中举做官或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进行补偿，则更易陷入贫困境地，这在古今都一样。晚明贫困生员之多，陈宝良在《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一文中作了阐述：“生员中贫生数量的渐趋增多，则是明代的基本趋势。即以贵州一省来说，至晚明，其贫生总数已达810名。这仅仅是官方有册籍登载者，其数量之大已不可等闲视之，而实际的贫生数量，则当远远超过此数。”三是生员仕进之途相当狭窄，贫困的生员相当多，他们如何维持生计？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陈宝良的文章及其他学者对此均未涉及，因而激发笔者欲从文人以文治生的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是否行得通？这让人十分困惑。笔者在翻阅文献过程中，逐渐发现，明代后期许多不遇士子都有“卖文为活”或代人笔耕的现象，这些人凭借一己之文才，或出入戎幕，或寄身藩府、大学士府，或在市井佣作诗文，或编印书刊……凡此种种，都是以文谋生的表现，知名者如郑若庸、吴扩、谢榛、卢柟、王稚登、俞安期、俞允文、王叔承、徐渭、陈继儒等，他们有的被称为“相门山人”、“布衣之杰”、“江湖诗人第一流”，有的是享誉一时的名士，有的“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有的被列入“后七子”、“广五子”、“四十子”……这些称号足以表明他们在当时词坛的不平常地位，以至有人说“诗在布衣”。再则，这一类人有何共同特征？谋生时的心态有什么不同？用以谋生的诗文与一般的吟咏性情之作有何区别？以文谋生何以能实现？以文谋生行为对文学创作本身起了怎样的作用？文人以文治生现象的出现对当时文坛有什么影响？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何在？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另外，之所以选择晚明这个历史阶段，是因为当时社会正处于大变化时期：纲纪废弛，朝廷的律令和传统道德对人的约束日益松弛，文人可能做出一些不循常规的举动；大城市和许多市镇的经济相对发达，商品交流频繁、金钱地位增加，对文人以文谋生的思想